

国民性培养的教育学思考

张鹏君, 李太平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国民性是民族传统文化在国民身上的特性体现,在意识、心理和行为中以稳定形态展现出来,是国民意识、国民精神等的总和,具体表现在民族思维方式、民族精神与核心价值观之中。自觉培养以现代国民精神为核心的国民性必要而迫切,当前的教育实践丢失了国民性,体现为国民性在教育方针中被淡化、在课程中受排挤、在校园文化中遭忽视诸方面。学校教育应具有清晰的国民性培养目标,凸显课程与教学的民族文化遗产功能,为国民性培养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关键词: 国民性; 民族精神; 教育方针; 校园文化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14)05-0025-05

Pedagogical Thinking of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ZHANG Peng-jun, LI Tai-ping

(School of Edu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character is the character's embodi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t is manifested by the inherent form in terms of ideology,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and it is also the summ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national spirit and so on. National character is concretely manifested in the national thinking modes,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core values. Consciously cultivating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hose corn is the modern national spirit is necessary and urgent. However,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practice loses the national character, which concretely embodies in the national character's desalin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policy, deletion of course structure and content, and weakness of campus culture. School education should have the clear training target of national character, and highlight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function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and create a good campus culture atmosphere for cultivating national character.

Key words: national character; national spirits; educational policy; campus culture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发展转型期,再提国民性培养这一话题,从教育学视域出发审慎分析国民性培养存在的问题,深入探讨“国民性”以回答

实践问题,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本文拟从国民性的意蕴、特征和具体表现着手,通过国民性培养的必要性及迫切性及存在问题的剖析,提出国民性培养

收稿日期:2014-02-19;修订日期:2014-05-06

作者简介:张鹏君(1981—),女,河南周口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教育基本理论、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李太平(1963—),男,湖北蕲春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德育理论研究。

对教育的实践诉求。

一、国民性解读

有关“国民”的思想,古今中外早已有之。“国民性”的批判和反思是中国近代以来研究的重点,学术界从不同视角进行过诠释和分析。国民性内涵及其特征的理解是进行相关研究的基础。

1. 国民性的内涵

西方语境中,“国民”源于拉丁语“natio(n)”,英文为“nation”。与“nation”相关的概念是“nation character”或“nation characteristic”,意思是“国民性格”或“国民特性”。在中国,“国民性”由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从日本引入,属于“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配合去‘意译’(或部分‘音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人民搬进现代汉语里面来,加以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1]。中外词源的含义并没有实质性区别。“nation”意为“国家、民族、国民、种族”,偏指民族国家,如中华民族,强调拥有国家权利。“character”有“(人的)性格、(地方的)特点、(某地人具有的特点)”之意;“characteristic”作为名词用有“特色”、“特征”的含义。“nation character”或“nation characteristic”指作为群体的民族或种族特点,中文指一个民族国家(或一个地域)大多数成员在一定时期内普遍具有的观念意识、社会心理行为方面固有的特征,两者都强调群体或民族的趋众特征、综合特征。

国民性不仅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和政治概念。它是一个民族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在国民身上的性格体现,并在思想意识、社会心理和行为中以稳定形态表现出来,是国民意识、国民精神、国民人格的总和。

2. 国民性的特征

(1)公共性与个体性。“国民”可从群体和个体两个层面来理解,“国民性”亦能从总体和个体的特征来剖析。从总体看,“国民性”是一国国民共有的,是历史文化习性的积淀。因为人是一定社会的存在物,受相关社会环境、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的影响,在相互交往中形成共有的群体性。如中庸思想、孝悌思想都是中国国民性的体现;追求实用、崇尚自由是美国国民精神的写照;“菊花与刀”——好美与好斗是日本国民兼具的矛盾性格。从个体看,“国民性”具有个性,即在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域的个体具有的特质。某些特质在不同民族或地域出现的概率,对个体产生影响的程度不同,从而成为某民

族或者某地域的个体特性。“千古中国,万种民性”正是个体差异性的体现。

(2)历史性和时代性。国民性是历史文化的产物,随历史而发展;时代性是各民族在同一时代或社会发展阶段表现出来的时代镜像。国民性的历史性和时代性是“源流关系”。即时代性源自历史性,但“源”并非“流”,时代性的“流”具有某些新质,即“时代性”随具体历史时期而变化;“流”又不能脱离“源”,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流”。从历史性看,国民性是纵向的发展,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新的民族文化的不断吸收、融合;从时代性看,国民性是横向的扩展,是与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交流。纵向发展是保持国民性的“粘合剂”,横向扩展是形成国民性的“催化剂”。这两种不同的取向是相互联系、相互推动的。国民性的历史状态决定其时代性发展的程度,国民性的时代高度又加速或延缓其历史性的变化。

(3)稳定性和可塑性。个体诞生时都会遇到先于他而存在的国民性体系,这些外在的国民性体系是在历史变迁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个体必然受其影响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国民性,在日常心理、行为中表现为持久的心理和行为。同时,国民性又不是脱离现实、跨越历史、超越时空的静止不变的形而上学实体,而是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时代变化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国民心理、观念和行为。没有不变的国民性,时代在发展,历史在进步,国民性也在不断变化。国民性的稳定性和可塑性使其得以不断传承,使国民性教育成为必要和可能。正是通过教育实践的显性作用及其潜移默化的文化熏染,对国民产生精神、心理影响,国民性才得以扬弃和发展。

(4)普适性与独特性。站在人的类特性的高度而言,国民性具有普适性。人性的善或恶在不同民族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并非具体某一国人所独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人类共有的特性。一定意义上说,“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国民性正是人性的体现,每一个民族的国民性中总有一小部分内涵交叉重叠,那就是体现为人性的‘共性’”^[2]。同时,一国的国民性总是相对他国的国民性而言的,由于受地域性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的影响,不同民族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文化性格等方面都有一定差异,在特定地域中形成自己民族特色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这都是国民性独特性的一面。

3. 国民性的具体表现

(1) 国民性体现在民族的思维方式之中。不同的民族国家在特有的自然地域和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各自的实践方式创造着属于本民族的文化,也形成了独有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体系蕴含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它构成了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的思维传统,从而成为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精神遗传’最根本的内容。”^[3]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质是由其民族精神决定的,各具特色的文化模式时刻影响着生活于该文化时空中的国民的思维方式。可以说,一种民族思维方式就是其民族精神或民族魂的体现,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国民性在思维方面的表达。如中华民族在特定地理环境下,在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长期封建专制统治、强烈的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注重从整体上凭借直觉思维认识事物,而不善于从不同层面把握对象、进行逻辑推理和分析。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国民表现出重人伦、法自然、重中庸等整体思维特征。

(2) 国民性体现在民族精神之中。“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推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所信奉的,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精神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这可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4]如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促使仁人志士和革命者探索政治制度改革和强国富兵之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以及探索建设新中国,正体现了国民性的自尊自强。民族精神是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不竭动力,能够促进民族的繁荣兴旺,激发个体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提升人们的精神追求。因此,只有那些对社会和个体能起积极作用的思想观念、心理情感、文化传统等精神因素才可称得上是民族精神。可见,国民性和民族精神均属精神的范畴,都涉及人的心理、精神、意识等,通过社会习俗、生活习性、宗教信仰、语言等表现出来。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国民性中积极合理的内容是构成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当然,二者不是简单的等同关系或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而是相互交融、具有重叠性的关系。

(3) 国民性体现在核心价值观之中。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基本构成,是区别不同民族国家的基本参照物,是促进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力量和载体。“社会价值观正是国民性的内在重要组成部分,国民性中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是其价值观的基础,价值观的变革取决于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的变

革。”^[5]核心价值观是民族国家普遍认同的价值理想、价值信仰、价值准则的集中反映,能够不断内化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向往,成为实现远大理想的精神支柱。“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它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中国先人以‘礼义廉耻’为当时的核心价值观,而今我们‘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6],不同时代的核心价值观都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表达了人们坚定的信念和美好愿望。对青少年学生来说,要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需要教育指引又需要立志修行。

二、国民性培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国民性培养是对国民性的理性体认与反思,并体现出促其向善的追求。古今中外,理性和善性都被看作人类普遍具有的本质属性。当前提出培养国民性问题,不只是批判其劣根性,亦非只肯定其优良性,而是要给予正向濡化和价值关怀,从而淡化其劣根性。从根本上说,国民性培养既要符合人性,又要改造人性。

1. 国民性培养的重要性

国民性培养对民族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担负着“成人”、“立德”的重任,培养良好的国民特性关系到民族的长远发展。以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为代表的先贤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希望通过国民性改造来救亡图存。面对封建社会和传统文化中家族本位、宗法观念导致的中国国民的自私、保守、奴性盲从与精神麻木,他们大声疾呼“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7],力主“由立人而立国”^[8]。如梁氏所言“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9]。可见国民性对于立国的重大历史作用。

国民性培养对个体的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10]现代意义的国民对民族情感、规范、目标的认同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需要指引和规范,不断激发其民族自觉意识

和民族责任感,从而提升个体的精神追求,引导其走向有意义的精神生活。当前全球化带来的价值多元使人们的精神家园日益失守,表现为精神生活的迷茫与核心价值观的离散;在个体精神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多元选择和挑战的情况下,对国民世界观、价值观、理想、信念等社会意识及态度、行为等社会心理予以培养和指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国民性培养的迫切性

就国内形势而言,国民性培养是构建核心价值观的需要。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作为个体的人成为利益主体和价值主体,由此导致利益和价值多元,必然带来诸多价值观念的矛盾与冲突。价值多元化对传统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了重大挑战,当前迫切需要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人们的一言一行,都潜在受制于价值观,大家都把它当作模式,依照它去判断是非,因而形成一种相当一致的‘基本态度’——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即所谓的国民性。”^[11]通过国民性培养,能够濡化国民积极的心理和行为,涤荡社会转型中消极、落后、错误的价值观念,解决现有价值困惑,引导人们的价值追求,为个体的价值实践提供价值选择的参照和标准,从而为和谐社会所需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从国际形势看,国民性培养是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需要。当今社会,全球化影响着世界各个角落。“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12]它不只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更是文化问题。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文化的转型。随着多元文化的传播交流和碰撞冲突,强势文化必然对弱势文化进行渗透和压制。文化与国民性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不同文化模式决定着不同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模式。也就是说,不同文化模式能够塑造不同的国民性。因此,国民性培养对于保护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安全,抵御外来文化霸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教育中国国民性培养的缺失

国民性培养具有现实重要性和迫切性,需要教育切实践行。然而,全面审视当前的教育,我们会发现在教育方针、课程设置与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只有先正视这些问题,才有可能解决国民性培养问题。

1. 教育方针中国国民性被淡化

新中国建国初期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把‘五爱’作为全体国民公德”^[13]。1957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4]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分析不同时期的教育方针,从强调民族的文化教育到培养社会主义有文化的劳动者,再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可以看出国民性的教育目标逐渐被淡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在我们面临着日益密切的国际交流和激烈竞争、东西方文化冲突和价值多元时,教育学生保持优良国民特性及其民族精神是学校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教育方针应该体现的时代要义。

2. 课程中国国民性受排挤

课程在国民性培养中起着重要作用。以义务教育阶段《语文》、《历史与社会》两门课为例,其课程目标都提到了民族精神、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但语文课程在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功能并没有凸显;能够体现民族精神的文章不多;传统优秀古诗文、文言文的学习侧重工具性价值;宣扬中国民俗文化的选文如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中的《云南的歌会》、《端午的鸭蛋》^[15],虽然为讲读课文,但实际教学侧重知识技能目标的达成;普通高中有关民族传统文化主题的内容多为选修。而且,语文教学中有关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常被简化为单纯知识的教学。以苏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中的《天安门广场》^[16]为例,突出体现为:识字教学、考虑分段;分析课文内容、找到能体现天安门雄伟壮丽与方位的词语;进行“选词填空”、“寻找广场建筑物”。然而,让学生体会天安门的壮丽雄伟和象征意义,由此想到祖国的伟大,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之情等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目标并没有充分展现。在重视字词掌握的同时,忽视了对热爱祖国语言文字情感的培养。从一定意义上说,应试教育几乎挤满了学习的时空,致使学生牢固掌握考试所需的书本知识成为最终目标,情感陶冶、民族精神培养以及其他知识的学习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挤。也正因如此,英语作为“主课”所受重视达到“白热化”程度,而作为承载民族国家本国史的历史课程却被作为“副课”不受重视。“初中历史课时很少,高中阶段多数学生根本就没有接受本国史教育;如果一些青少

年上完初中、高中即就业,他们将终生不再接受本国史教育;即使考上大学,如果没有进历史系,也将终生不再接受正式的本国史教育。”^[17]可见,代表优秀民族文化的课程突显了工具功能,而培养国民性的文化功能彰显不足,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

3. 校园文化中国民性遭忽视

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是学校发展的推动力,也是学生发展的“助力器”。它以不同形式作用于学生,传递着不同的教育价值观,是进行人文教育,形成良好的道德和心理素质,塑造人生观、世界观的重要途径。当前校园物质文化建设更注重硬件和显性方面,忽视其软件和隐性文化作用。趋同化的校园建筑难以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魂魄,也不能演绎成文化符号对学生产生熏染。有些校园文化活动不能集教育性、娱乐性和思想性于一体,娱乐功能过度,教育功效不足;学生参与自由度不高,受到各种规则限制;形式化较为严重,注重评比结果而忽视参与过程;不能促使学生形成凝聚力、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以及民主平等精神;民族文化精髓的传承逐步削减,西化、洋化明显增强。“Happy Halloween 够胆你就来”、“圣诞谜语大赛”之类的西方文化主题活动热情刺激,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动却开展不足、内容贫乏,难以体现较高的创造性、较强的时代性和鲜明的民族性,更难以通过校园文化活动的策划和实施,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学生疏离于文化经典、消遣化地课外阅读、热烈拥抱西方节日和消费文化等诸多现象,从侧面体现出校园文化对学生价值选择引导的缺失,在促使学生形成历史使命感、民族责任感等方面作用欠缺。

四、国民性培养教育的实践诉求

塑造现代国民性,需要明确国民性培养目标,淡化课程的工具意识,突出其文化功能,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1. 明确国民性培养的目标

教育方针的落实最终体现在培养目标的实现上。因此,学校教育应具有清晰的国民性培养目标。当前我国的教育培养目标在沿袭“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础上,增加了与时俱进的内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全球化背景下,培养合格公民是世界各国教育的基本价值和培养目标。因此,我国社会加速转型期教育的目标,

就是要培养国民既有爱国情怀又有国际视野,既有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又有对外文化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要唤醒国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民主平等精神,使其拥有“自主之意识”、“自由之精神”、“自治之能力”、“自立之人格”,具备优良的国民性格和新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从而实现“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教育改革目标。

2. 凸显课程国民性培养的文化功能

课程是人类文化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内容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映越真实,就越能培养国民性。以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为例,《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版)》的基本课程理念是“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教育应在注意普适性的同时加强民族精神教育,数学课程内容需要随时代发展而更新,必须根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缺乏中国数学史、中国传统数学内容,没有民族特点是不足取的”。^[18]因此,在数学教学中需要不失时机地融入具有地域特色、民族情感的素材,在充分理解和把握教学内容和思想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增减或创生,从而潜移默化地给予学生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只有如此,才能“向青少年一代传承民族文化传统,阐释民族文化精神,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民族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19]。

3. 增强校园文化国民性培养的“磁力”

国民性培养不仅可以通过课程和教学进行,而且能以校园文化为实施途径。积极向上、和谐民主的校园文化具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渗透性和不可抗拒的“磁场效应”,可培养学生的民主素质、国民道德、社会责任感等。校园文化活动要适应时代发展和国民性培养的要求,围绕现代合格公民的培养目标,以提高学生的公民意识、自由平等精神、创新能力为重点,积极利用校园文化活动在新型公民培养中的优势,为国民性培养创造有利条件。如以不同类型的社团和丰富的文体活动为载体,可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和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促进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并在活动参与过程中逐步发现、完善自我,形成团队合作精神、集体责任感;促使学生在集思想性、娱乐性、教育性为一体的多彩活动中和谐发展,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其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国家意识和文化认同。兼具时代特征和各自特色的校园文化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陶冶和培养学生的国民性。

(下转第48页)

- [9] HSIEH H F, SHANNON S E. Three Approaches to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J].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005, 15(9): 1277-1288.
- [10] 袁志刚. 失业理论与中国失业问题[J]. 经济研究, 1994, (9): 32-37.
- [11] 刘韬, 汪戎. 西方就业理论演变及发展趋势的综述[J]. 知识经济, 2013, (3): 19-20.
- [12] 苏治, 张景贺, 黄向前. 从搜寻理论到失业释解与政府经济对策[J]. 财贸经济, 2011, (7): 127-132.
- [13] 袁红春, 吴健中, 梁博. 西方失业理论研究综述[J]. 经济学动态, 2000, (5): 22-24.
- [14] HOLDEN S, NYMOEN R. Measuring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NAWRU Estimate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04(1): 87-104.
- [15] CHEN J, KANNAN P, TREHAN B, et al. New Evidence on Cyclical and Structural Sources of Unemployment[J]. IMF Working Papers, 2011: 1-42.
- [16] PHELPS E. The Origins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J].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1995, (25): 15-31.
- [17] 杨伟国. 借重“看得见的手”——谈谈国外对大学生就业的政策支持[J]. 求是, 2004, (6): 58-60.
- [18] 李艳. 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消极影响及对策浅析[J]. 学理论, 2013, (32): 326-327.
- [19] 浦瑛瑛. 大学生就业心理剖析及调适优化途径[J]. 中国大学生就业, 2006, (6): 46-47.
- [20] IRMEN A. Frictional Unemployment,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J]. Economics Bulletin, 2009, 29(2): 1127-1138.
- [21] 刘强, 杨娜. 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信息需求与效率改进[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8, 29(7): 32-35.
- [22] 温海池, 李革森. 中国当前失业类型探析[J].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经济管理版), 2005, 14(2): 17-21.
- [23][24] 岳昌君. 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 2003~2011[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2, 10(1): 32-49.
- [25] REDER M W. Wage Structure and Structural Unemployment[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4, 31(4): 309-322.
- [26] 黄燕东, 姚先国. 中国行业收入不平等问题的解析[J]. 当代财经, 2012, 2(9): 113-121.
- [27] 任重, 周云波. 垄断对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9, (4): 25-30.

(本文责任编辑 邓建生)

(上接第 29 页) 总之, 国民性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命题, 具有受诸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特征。全球化竞争需要提高国民素质, 社会发展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国民特性。从教育学视域审视国民性培养现存问题, 需从培养目标、教材与教学内容、校园文化建设诸方面进行多维思考, 以满足实践诉求。

参考文献:

- [1] 高名凯, 刘正琰. 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M].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 88.
- [2] 摩罗, 杨帆. 人性的复苏——国民性批判的起源与反思[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301.
- [3] 陈中立, 杨楹, 等. 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22-123.
- [4] 张岱年. 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J]. 学术月刊, 1986, (12): 1-3.
- [5][11] 袁洪亮. 论社会价值观的近代转换对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影响[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 (4): 46-50.
- [6] 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5-04(2).
- [7][8][9] 梁启超. 新民说[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48, 68, 54.
- [10] 英格尔斯. 人的现代化[M]. 殷陆军,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8.
- [12] 罗兰·罗伯森. 全球化: 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 梁光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1.
- [13] 毛礼锐, 沈灌群. 中国教育通史(第六卷)[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2.
- [1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385.
- [15] 课程教材研究所, 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下册)[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128-140.
- [16] 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四年级上册)[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 27-30.
- [17] 李太平, 黄岚. 论教育的民族性[J]. 高等教育研究, 2012, (11): 13-18.
- [18] 张维忠. 文化传统与数学课程改革[J]. 教育研究, 1996, (5): 63-67.
- [19] 石中英. 学校教育与国家文化安全[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0, (11): 11-14.

(本文责任编辑 骆四铭)